

朱熹《孟子序说》文本溯源与义理发微

赵庆伟

(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,湖北 武汉 430073)

摘要: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·孟子集注》卷首的《孟子序说》,首引司马迁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之文,可谓“知人论世”之必要铺垫;次引韩愈言论,重在揭示孟子辟杨、墨之功及其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特殊位置;再引二程言论,则重在揭示孟子性善论、养气论的价值;最后又借杨时之言,将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归结到心性论上,而这正是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、自我完善,与佛、老由势若水火走向互相交融的关键思想资源。这既符合历史的逻辑,也彰显出思想学说自身的发展特点。

关键词:朱熹;《孟子序说》;《四书章句集注》;儒学;道统论;心性论;理学

中图分类号:K245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672-433X(2014)04-0165-06

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将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集为一书,并加以注释阐发的著作。朱熹在其中系统地论述了道、理、性、命、心、诚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格物、致知等理学范畴及其关系,既辨析精微,又强调人伦日用,体现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及其强调认识方法、修养方法、道德践履的特点。该书包括《大学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各一卷和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、《孟子集注》十四卷,凡二十六卷,朱熹经过40年的修改,文字诠释颇为严谨洗练,义理阐发更显微独到,特别注意从整体上去探求原书的思想体系,成为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,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和宋明理学的重要典籍,其影响相当深远。

《孟子集注》集中阐述了朱熹对孟子思想学说的创造性解释。卷首有《孟子序说》一文,篇幅不长,分别引用了司马迁、韩愈、二程、杨时等人对孟子及其思想的评价,实际上也间接地表达了朱熹对孟子行事特别是对其思想的想法,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儒家思想的道统谱系、孟子思想价值的全面揭示、孟子思想与理学的内在关联等诸方面的内容。兹大体按照原文顺序,对其文本来源与义理精蕴进行追溯和发掘。

一、司马迁对孟子思想价值特征的评述

《史记列传》曰:“孟轲,驺人也,受业子思之门人。道既通,游事齐宣王,宣王不

能用。适梁,梁惠王不果所言,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当是之时,秦用商鞅,楚、魏用吴起,齐用孙子、田忌。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,以攻伐为贤。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,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、《书》,述仲尼之意,作《孟子》七篇。”

以上为《孟子序说》的第一段引文,出自《史记》卷七十四《孟子荀卿列传》,原文与此稍异:“……当是之时,秦用商君,富国强兵;楚、魏用吴起,战胜弱敌;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,而诸侯东面朝齐……”^{[1]2343}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为孟子立传,仅用了137个字,而且将其与邹衍、淳于髡、慎到、荀子等合为一传,并在开篇表达了这样的感叹:“余读《孟子》书,至梁惠王问‘何以利吾国’,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:嗟乎,利诚乱之始也!夫子罕言利者,常防其原也。故曰‘放于利而行,多怨’。自天子至于庶人,好利之弊何以异哉!”^[1]

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只是简略地介绍孟子的行事与思想特点,并阐述了孟子学说在战国时代不被采纳的原因。应该说,其见解是颇为深刻的。朱熹引用这段话的主要原因,应该还是其中的孟子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、“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”及“述仲尼之意”等语,因为这牵涉到儒家的道统和谱系问题。

说到对于孟子及其思想的评价,大概以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中对子思、孟子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

收稿日期:2014-01-14

作者简介:赵庆伟,男,中南民族大学教授,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。E-mail:zhaoqingwei68@163.com

统”的批判为最早^[2]。有汉一代,比较值得注意的有扬雄、赵岐和王充三家。扬雄在其《法言·吾子》中充分肯定了孟子的学术贡献,并以孟子自比,他说:“古者杨、墨塞路,孟子辞而辟之,廓如也。后之塞路者有矣,窃自比于孟子。”^[3]今传汉人注《孟子》仅赵岐一家,其《孟子章句》是完整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《孟子》注,大致以训诂名物为主,间亦及于义理阐发,是研究汉代孟学的珍贵资料。诚如阮元《孟子注疏校勘记·序》中所言:“赵岐之学,以较马、郑、许、服诸儒稍为固陋,然属书离辞,指事类情,于训诂无所戾。七篇之微言大义,藉是可推。且章别为指,令学者可分章寻求,于汉传注别开一例,功亦勤矣!”^[4]在《孟子题辞》中,赵岐提及《孟子》曾在汉文帝时一度与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和《尔雅》同立为“传记博士”^{[5]17},其地位列于经、子之间,后罢传记博士,但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和《尔雅》著录在《六艺略》的《论语类》和《孝经》类,却将《孟子》著录于《诸子略·儒家类》,可见《孟子》的地位还不高。赵岐还首次将孟子尊为“亚圣”,他称赞《孟子》“包罗天地,揆叙万类,仁义道德,性命祸福,粲然靡所不载,帝王公侯遵之,则可以致隆平,颂清庙;卿大夫士蹈之,则可以尊君父,立忠信;守志厉操者仪之,则可以崇高节,抗浮云。有风人之托物,《二雅》之正言,可谓直而不倨,曲而不屈,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”^{[5]13}。这种稍嫌过誉之辞,尽管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,但在孟学发展史上还是具有独特且重要的社会意义的。王充则在《论衡·刺孟篇》中从八个方面来非难、抨击孟子,如批评孟子所言“何必曰利”未能区分货财之利与安吉之利,“违道理之实”^{[6]450-451};斥责孟子“五百年有王者兴”之词“论不实事考验,信浮淫之语”等^{[6]458}。王充的观点,是自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以来对《孟子》最严厉的指责,并且成为了唐宋疑孟、非孟思潮的重要开端。

有学者认为,孟子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地位,是通过逐步消解“孟荀齐号”范式,不断凝聚“孔孟一体”规模而得以提升的,这既表明孟子思想体系与汉代政治建设、文化发展相适应,同时也对唐宋间的孟子升格、《孟子》升经运动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史影响^[7]。还有学者总结了两汉孟学研究的思想价值,认为:“两汉治孟的思想价值,在于它张扬了一种人道思想和理性政治精神,从而为打破经学独尊和促进儒、道两家思想的整合,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”^[8]。

或许在朱熹看来,汉儒特别是赵岐对孟子思想的评价并没有说到点子上,或者说,汉儒并没有真正揭示孟子思想的价值,对于当时理学的建构,可取者不多。所以,这些评价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。汉、宋学术分野及其造成的影响,于此可见一斑。

二、韩愈对儒家道统及孟子思想价值特征的评述

韩子曰:“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,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。”

又曰:“孟氏醇乎醇者也。荀与扬,大醇而小疵。”

又曰:“孔子之道大而能博,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,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。其后离散,分处诸侯之国,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,源远而末益分。惟孟轲师子思,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。自孔子没,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。故求观圣人之道者,必自孟子始。”

又曰:“扬子云曰:‘古者杨、墨塞路,孟子辞而辟之,廓如也。’夫杨、墨行,正道废。孟子虽贤圣,不得位。空言无施,虽切何补。然赖其言,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,崇仁义,贵王贱霸而已。其大经大法,皆亡灭而不救,坏烂而不收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,安在其能廓如也?然向无孟氏,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。故愈尝推尊孟氏,以为功不在禹下者,为此也。”

以上各段引文皆出自韩愈之文,具体说来,第一段出自《原道》^{[9]174},第二段出自《读荀》^{[9]183},第三段出自《送王秀才序》^{[9]290},第四段出自《与孟尚书书》^{[9]268}。韩愈之语重在表彰孟子辟杨、墨之功,所谓“故愈尝推尊孟氏,以为功不在禹下者,为此也”。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“道统”论。

“道统”论在韩愈之前已现端倪。《论语》终篇《尧曰》中称:“尧曰:‘咨!尔舜!天之历数在尔躬,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,天禄永终。’舜亦以命禹。”这其中已包涵了尧传舜、舜传禹的意味。孟子则力辟杨、墨,自命上承孔子之正统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中说: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,其间必有名世者。”《孟子》终篇《尽心下》中更明确地指出:“由尧、舜至于汤,五百有余岁,”“由汤至于文王,五百有余岁,”

“由文王至于孔子,五百有余岁,”“由孔子而来至于今,百有余岁,去圣人之世,若此其未远也;近圣人之居,若此其甚也,然而无有乎尔,则亦无有乎尔”。

韩愈生于中唐时期,面对佛、老盛行和儒家文化式微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,力图复兴儒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,重整思想秩序和社会规范,就仿照佛教的传法世系“法统”,在其《原道》一文中首先明确指出了儒家之“道”的内涵:“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谓义,由是而之焉之谓道,足乎己而无待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,道与德为虚位。”在韩愈看来,作为儒家核心价值的“道”的延续及其作用,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授受者之间的传承系统或谱系,其中包括尧、舜、禹之间的口授亲传,也有孔子之于周公、孟子之于孔子的精神传承。“斯吾所谓道也,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,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。”韩愈所谓的“道”既不是佛家的“道”,也不是道家的“道”,而是儒家所特有的仁义之道,“其文: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;其法:礼、乐、刑、政;其民:士、农、工、贾;其位: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;其服:麻、丝;其居:宫、室;其食:粟米、果蔬、鱼肉。其为道易明,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为己,则顺而祥;以之为人,则爱而公;以之为心,则和而平;以之为天下国家,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,死则尽其常。效焉而天神假,庙焉而人鬼飨”。在韩愈看来,只要确认了这个“道”,社会生活就会重新进入合理而有序的轨道。

韩愈认为,圣人之道在孟子之后就失传了,其原因在于荀子与扬雄这些大儒“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”。这样一来,孟子就成为儒家之“道”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,要追本溯源必须从孟子开始,要开拓创新也必须从孟子开始。“惟孟轲师子思,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。自孔子没,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。故求观圣人之道者,必自孟子始”。由此,韩愈便以继承道统自任,表示要像孟子批判杨、墨那样,担负起捍卫儒家之“道”的历史重任。他在《与孟尚书》中说:“释、老之害,过于杨、墨;韩愈之贤,不及孟子。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,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。呜呼!其亦不量其力,且见其身之危,莫之救以死也。虽然,使其道由愈而粗传,虽火死万万无恨。”正是由于韩愈的推崇,才有了所谓的孟子“升格运动”^{[10]105-106、[11]}。

传统观点认为,孔子以后,儒分为八,到战国中后期演变为两大分支。一支始于子夏,讲文献之学,数传而至于荀子;一支始于曾参,究义理之学,二传而至于孟子。于是,荀子为汉代经学家所尊信,而孟子则为两宋以后道学家所崇敬。儒家内部这两派的分野,也就是后世所谓的“学统”与“道统”之别,“汉学”与“宋学”之分。必须指出的是,韩愈推尊孟子,主要是出于与佛、老等异端思想斗争的需要,与宋代理学家从精神修养方面吸收孟子思想是不同的。在韩愈眼中,孟子与被儒家视为异端的杨、墨所作的斗争,乃是儒家反对异端思想的典范,对于唐代的反对佛、老斗争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激励作用。

三、程颐对孟子思想价值特征的评述

或问于程子曰:“孟子还可谓圣人否?”程子曰:“未敢便道他是圣人,然学已到至处。”

程子又曰:“孟子有功于圣门,不可胜言。仲尼只说一个仁字,孟子开口便说仁义。仲尼只说一个志,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。只此二字,其功甚多。”

又曰:“孟子有大功于世,以其言性善也。”

又曰:“孟子性善、养气之论,皆前圣所未发。”

又曰:“学者全要识时。若不识时,不足以言学。颜子陋巷自乐,以有孔子在焉。若孟子之时,世既无人,安可不以道自任。”

又曰:“孟子有些英气。才有英气,便有圭角,英气甚害事。如颜子便浑厚不同,颜子去圣人只毫发间。孟子大贤,亚圣之次也。”或曰:“英气见于甚处?”曰:“但以孔子之言比之,便可见。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。比之玉,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,无许多光耀也。”

以上引文均出自程颐。第一段出自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九《伊川先生语五》,原文与此稍异:“邓文孚问:‘孟子还可为圣人否?’曰:‘未敢便道他是圣人,然学已到至处。’”^{[12]255}第二段出自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《伊川先生语四》,原文与此稍异:“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。如仲尼只说一个仁义,……”^{[12]221}第三段系意引自《河南程氏粹言》卷二《圣贤篇》、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一《二先生语一》,相关原文分别为:“子曰:‘人有颜子之德,则有孟子

之事功,孟子之事功,与禹、稷并’。”“凡人说性,只是说继之者善也,孟子言人性善是也。”^{[12]1236,10}第四段出自《河南程氏文集》卷九《伊川先生文五·答杨时论西铭书》,原文与此稍异:“《西铭》之为书,推理以存义,扩前贤所未发,与孟子性善、养气之论同功(原注:二者亦前圣所未发),岂墨氏之比哉?”^{[12]609}第五段出自《河南程氏文集》卷二上《二先生语二上》^{[12]15},最后一段出自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《伊川先生语四》,原文与此稍异:“曰:‘……孟子却宽舒,只是中间有些英气,才有英气,便有圭角。英气甚害事。如颜子便浑厚不同。颜子去圣人,只豪发之间。孟子大贤,亚圣之次也。’或问:‘英气于甚处见?’曰:‘但以孔子之言比之,便见。如冰与水精非不光,比之玉,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,无许多光耀。’”^{[12]196-197}。

二程“尊孟”的言论很多,在其看来,孟子的功绩主要在其仁义、性善、养气之论,特别是后两者,“皆前圣所未发”。在辨别颜渊与孟子的优劣时,二程的基本倾向虽然是认为颜子更具备“圣人气象”,而孟子则有“英气”、“好辩”,但他们强调指出这是时势使然,是“世既无人”,孟子“以道自任”的结果。

韩愈的“道统”论及其自续“道统”的精神,均为宋儒所接受。如石介在《与土建中秀才书》中提出了所谓圣贤相传的道统论,认为“道”在圣人孔子那里就已经尽善尽美了,其后护卫此道的“贤人”,主要有孟轲、扬雄、王通和韩愈四人^{[13]24}。在《泰山书院记》一文中,石介还曾把自己的老师孙复推许为韩愈后的“道统”继承人^{[13]63-64}。二程则自以为其学说将孟子身后中断了的儒学道统接续起来。程颐等人在《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》中推尊程颢说:“孟子之后,传圣人之道者,一人而已。”^{[12]639}“周公没,圣人之道不行;孟轲死,圣人之学不传。道不行,百世无善治;学不传,千载无真儒。……先生(指程颢)生千四百年之后,得不传之学于遗经,志将以斯道觉斯民。”^{[12]640}二程以“理”(“天理”)作为自己最高的哲学范畴,认为“理”适用于自然、社会乃至一切具体的事物,这就把儒家传统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,用“天人一理”的形式表达了出来。可以认为,二程的思想核心,就是高扬孔孟儒学的精神,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,注重人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。这也就是经过改造更新后的儒学对佛、道思想挑战所作出的有力回应^{[14]211}。

朱熹本于二程,特别尊崇《孟子》和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使之与《论语》并列,认为四者代

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、子思传到孟子的儒家道统,而二程与其本人则是其继承者。朱熹明确提出“道统”以概括韩愈关于儒学传承系统的思想,他说:“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,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。”^[15]但朱熹的道统说却把韩愈排斥在外,认为只有程颢、程颐才是上承孟子的正统思想家:“天先生伏羲、尧、舜、文王,后不生孔子,亦不得;后又不生孟子,亦不得;二千年后又不生二程,亦不得。”^{[16]2350}朱熹自许为二程的私淑弟子,他说:“宋德隆盛,治教休明,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,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。……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、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。虽以熹之不敏,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。”^[16]朱熹门人黄榦进一步明确了朱熹在这一传承体系中的独特地位,他在《朱子行状》中指出:“自周以来,任传道之责,得统之正者,不过数人,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,一二人而止耳。由孔子而后,曾子、子思继其微,至孟子而始著。由孟子而后,周、程、张子继其绝,至先生而始著。”^[17]尽管孔子之后有曾子、子思,但至孟子“始著”;孟子之后,复有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,而至朱熹“始著”。此语大有以朱熹直承孟子之意。

有意思的是,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,不仅不把韩愈放在眼里,就是二程等北宋学者也被抛在了—边,认为只有他自己才真正是上接孟子的“道统”接班人。他说:“韩退之言‘轲死不得其传’,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,然直是伊洛诸公,得千载不传之学,但草创未为光明,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,更干当甚事!”^{[18]436}“窃不自揆,区区之学,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—明也。”^{[18]134}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儒学发展历程中,在讲究正统、异端的思想背景下,这种说法并不难理解。只是历史最终选择的是程朱,《宋史》中的《道学传》,使二程、朱熹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。

四、杨时对孟子思想价值特征及其与理学内在关联的评述

杨氏曰:“《孟子》—书,只是要正人心,教人存心养性,收其放心。至论仁、义、礼、智,则以恻隐、善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心为之端。论邪说之害,则曰:‘生于其心,害于其政。’论事君,则曰:‘格君心之非’,‘—正君而国定’。千变万化,只说从心上来。人能正心,则事无足为者矣。《大学》之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其本只是正心、诚意而已。心得其正,然后知性之善。

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。欧阳永叔却言‘圣人之教人,性非所先’,可谓误矣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,尧舜所以为万世法,亦是率性而已。所谓率性,循天理是也。外边用计用数,假饶立得功业,只是人欲之私。与圣贤作处,天地悬隔。”

这段引文出自杨时《龟山集》卷十二《语录三·余杭所闻》^[19]。原文与此稍异:“《孟子》一部书,只是要正人心,教人存心养性,收其放心。至论仁、义、礼、智,则以恻隐、善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心为之端。论邪说之害,则曰:生于其心,害于其政;论事君,则欲格君心之非、正君而国定。千变万化,只说从心上来。人能正心,则事无足为者矣。《大学》之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其本只是正心、诚意而已。心得其正,然后知性之善。孟子遇人便道性善。永叔却言‘圣人之教人,性非所先’。永叔论列是非利害,文字上尽去得,但于性分之内全无见处。更说不行,人性上不可添一物,尧舜所以为万世法,亦只是率性而已。所谓率性,循天理是也。外边用计用数,假饶立得功业,只是人欲之私。与圣贤作处,天地悬隔。”杨时曾先后师事程颢、程颐,与游酢、谢良佐、吕大临并称“程门四大弟子”。一般认为,程门弟子中以谢良佐最具创造性,而杨时传道之功最巨。杨时晚年隐居龟山,学者称龟山先生,学术地位日隆,南宋理学几乎都与他的传授有关系,史称渡江之后,“东南学者惟杨时为程氏正宗”^[20]。杨时门人中以罗从彦最有见地,而朱熹就是罗从彦门人李侗的学生。

杨时的这段话,直指孟子的心性论。杨时早年用功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,后来又曾出入佛教,故其思想颇受佛、老之影响。在他看来,儒家讲道心,佛家讲真心,其实都是引导人们反求本心。所谓“《孟子》一书,只是要正人心,教人存心养性,收其放心”;“心得其正,然后知性之善。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”,都表明了杨时在心性论方面的深厚修养。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欧阳修的批判,“圣人之教人,性非所先”两句,系意引自欧阳修晚年自编的《居士集》卷四十七《答李诩第二书》^[21]。相关原文为:“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,故常为说曰:夫性,非学者之所急,而圣人之所罕言也。”“修少好学,知学之难。凡所谓六经之所载,七十二子之所问者,学之终身,有不能达者矣;于其所达,行之终身,有不能至者矣。以予之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它,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。又以知圣人所以教人垂世,亦皇

皇而不暇也。今之学者,于古圣贤所皇皇汲汲者,学之行之,或未至其一二,而好为性说,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,执后儒之偏说,事无用之空言,此予之所不暇也。或有问曰:性果不足学乎?予曰:性者,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。为君子者,修身治人而已,性之善恶,不必究也。”

欧阳修极力推尊孟子,认为:“孔子之后,唯孟子最知道”^[22]。苏轼也这样评价欧阳修:“其学推韩愈、孟子,以达于孔氏,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。其言简而明,信而通,引物连类,折之于至理,以服人心。故天下翕然师尊之。自欧阳子之存,世之不悦者,哗而攻之,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,士无贤不肖,不谋而同曰:‘欧阳子,今之韩愈也。’”^[23]当然,欧阳修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,与韩愈是有区别的。他认为不能采取韩愈所谓“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居”的简单做法,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应该是弘扬儒家的礼义教化。在《答李诩第二书》中,欧阳修借审阅李诩的《性论》三篇,明确指出,儒家的王政、礼义与治道息息相关,而“性命之学”则“非学者之所急”,对当时初兴的心性之学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。按欧阳修的观点,心性之说是“无用之空言”,君子应该把精力用于修身治人,不必去追究性之善恶。因为,如果性本善,身也不可以不修,人也不可以不治;如果性本恶,仍然是身也不可以不修,人也不可以不治。如果不修其身,虽君子而为小人;如果能修其身,虽小人而为君子。所以,君子应该“以修身治人为急务,而不穷性以为言”。欧阳修以儒经不言性为据,坚持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,这可以说是他的长处,但恰恰也是他的弱点。不可否认,儒家的王政、礼义对于修己治人确实有其优越的一面,所以也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。但说到心性之学,佛教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套精密细致的体系和方法,儒家学说在当时情况下是明显难望其项背的。儒家要想对佛教采取攻势,正确的做法除了要大力宣扬儒家的仁义礼乐之说外,更重要的还应该加强自身的建设,特别是对于心性理论方面的探究。杨时的一句“可谓误矣”,算是说到了点子上。当然,欧阳修看到了佛教“为善之说”的长处,提出了“修其本以胜之”的方法,在当时乃至稍后的排佛道运动中仍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。正是基于这一点,有学者认为,北宋理学的真正开创者应该是欧阳修,而不是周敦颐^{[14]295}。

五、结语

朱熹不愧是一位文化大师,经过他的妙笔,看似

简单的几段文字,便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系统。起首引太史公之文,可谓是“知人论世”,并为后面做好铺垫;接下来引韩愈言论,重在揭示孟子辟杨、墨之功,及其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特殊位置;二程的言论,则重在揭示孟子性善论^[24]、养气论的价值;最后又借杨时之言,将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归结到心性论上,而这正是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、自我完善,与佛、老由势若水火到走向互相交融的关键思想资源。这样的结构,既符合历史的逻辑,也彰显出思想学说自身的发展特点。

孟子思想的价值是逐渐被揭示出来的,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。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其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,他们推尊、借鉴甚至反对、批判孟子的过程,既是对孟子思想的发掘,也是

对孟子思想的选择。推尊孟子的依据很简单,那就是在孟子的思想学说里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。说到底,无非是借诠释孟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,完成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。所以,随着时代的发展,孟子思想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。南宋初年,施德操在其《孟子发题》一文中全面总结了孟子之功,他说:“孟子有大功四:道性善,一也;明浩然之气,二也;辟杨、墨,三也;黜五霸而尊三王,四也。是四者,发孔氏之所未谈,述六经之所不载,遏邪说于横流,启人心于方惑,则余之所谓卓然建明者,此其尤盛者乎!”^[25]这样的评论,大体上代表了宋代推尊孟子的学者对于孟子思想价值的基本认识,为我们理解孟子,领悟朱熹眼中的孟子思想价值,及其《孟子序说》“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”的妙处,无疑提供了极好的参照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司马迁.史记:卷七十四“孟子荀卿列传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:2343.
- [2] 王先谦.荀子集解:卷三“非十二子”[M].沈啸寰,王星贤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8:94.
- [3] 汪荣宝.法言义疏:四“吾子”[M].陈仲夫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7:81.
- [4] 阮元.十三经注疏(附校勘记):孟子注疏校勘记序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:2664.
- [5] 焦循.孟子正义:卷一“孟子题辞”[M].沈文倬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7.
- [6] 黄晖.论衡校释(附刘盼遂集解):卷十“刺孟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0.
- [7] 杨海文.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[J].齐鲁学刊,1998(3).
- [8] 丁原明.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[J].文史哲,2000(2).
- [9] 韩愈.韩昌黎全集[M].北京:中国书店,1991.
- [10] 周予同.群经概论[M].上海:上海书店,1990.
- [11] 徐洪兴.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[J].中国社会科学,1993(5).
- [12] 程颢,程颐.二程集[M].王孝鱼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- [13] 石介.石徂徕集[M]//丛书集成初编本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6.
- [14] 徐洪兴.思想的转型——理学发生过程研究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6.
- [15] 黎靖德.朱子语类:卷九十三“孔孟周程张子”[M].王星贤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:14.
- [16] 朱熹.四书章句集注:大学章句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17] 王云五,王懋竑.宋朱子年谱:卷之四下[M]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,1991:235.
- [18] 陆九渊.陆九渊集:卷三十五·语录下[M].钟哲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[19] 杨时.杨龟山集:卷之二“语录·余杭所闻”[M]//丛书集成初编本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6:31-32.
- [20] 脱脱,等.宋史:卷四二八“道学传二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:12738.
- [21] 欧阳修.欧阳修全集·居士集:卷四十七“答李诩第二书”[M].北京:中国书店,1986:319-320.
- [22] 欧阳修.欧阳修全集·居士外集:卷十六“与张秀才第二书”[M].北京:中国书店,1986:482.
- [23] 苏轼.苏东坡全集·前集:卷二十四“居士集序”[M].北京:中国书店,1986:315.
- [24] 郭齐勇.孟子性善论所涵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问题[J].湖北大学学报,2013(5).
- [25] 黄宗羲,全祖望.宋元学案:卷四十“横浦学案”[M].陈金生,梁运华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:1319.

(责任编辑 程 苹)